

中职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路径探究

石家庄财经商贸学校 方青路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灵魂与初心,是各级各类教育必须坚守的根本任务。目前,部分中职思政课固守传统讲授模式,内容脱离职业岗位实际,德育工作未能真正发挥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核心作用。因此,重构中职思政育人体系、优化育人路径、破解育人难题,是中职思政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中职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困境

(一)课堂教学模式固化,价值引领力度不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思政课堂坚持思想引领、情感浸润、价值塑造。但当前多数中职思政课仍以单向理论灌输为主,教学方式枯燥僵化。课堂案例多为通用时政素材,无法将工匠精神、职业诚信、岗位责任、行业底线融入教学,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内在道德素养。

(二)德育育人相互割裂,背离德技并修育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要坚持德技并修、育人为本。当前中职育人体系仍存在“德技分离”问题,专业课教师聚焦实操教学和技能考核,忽视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职业道德的渗透;思政教师不熟悉专业岗位规范和行业要求,思政教学与实训实践脱节,未能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三)实践育人载体薄弱,知行合一难以落地。总书记指出,立德树人重在知行合一,要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目前中职学校实践教学形式单一,多以主题班会、升旗仪式等常规活动为主,缺少劳动实践、职业体验和品德锤炼载体,道德认知无法转化为行为习惯。

(四)育人主体协同不足,大思政格局尚未成型。总书记明确要求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当前中职学校育人主体较为分散,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班主任、企业导师、家长之间缺乏联动机制,校内德育、家庭教育、企业实训育人相互脱节,多方育人力量无法同向发力。

二、中职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路径

(一)优化课堂教学,筑牢立德树人主阵地。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思政

课育人要求,坚守课堂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全面革新思政课堂教学。在教学内容上以《职业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为依托,精选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行业先锋典型案例,结合不同专业岗位的职业规范、诚信准则等重构教学内容,让思政教学贴近职业、贴近学生。丰富教学方式方法,切实提升思政课堂的育人感染力。

(二)深化课程思政融合,落实德技并修育人目标。践行总书记德技并修育人理念,推进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建立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集体备课、协同教研机制,深度挖掘各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工科专业融入精益求精、实业报国的工匠精神,服务类专业融入诚信友善、敬业奉献的职业素养,实训课程强化纪律意识、安全意识和劳动品质。

(三)丰富实践育人载体,推动知行合一落地生根。遵循总书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育人思想,搭建校内校外一体化实践育人平台。校内常态化开展劳动周、技能节等活动,强化学生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行为养成教育。校外依托红色教育基地、社区服务平台、实训基地,组织学生开

展红色研学、志愿服务、岗位德育见习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体悟劳动价值、锤炼职业品德,实现立德树人从理论认知到行为自觉的转化。

(四)建强师资队伍,夯实立德树人育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力量。中职学校需持续加强思政师资队伍建设和定期组织思政教师参与跟岗实践、课程研修、教学培训,提升教师职业认知、教学创新和价值引领能力。面向全体教师开展德育培训,树立“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育人理念。

(五)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全域大思政育人格局。立足总书记“三全育人”工作要求,整合学校、家庭、企业三方育人资源,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强化家校协同,引导家长重视学生品德养成,形成家校德育合力。深化校企协同,将企业职业素养、行业道德规范融入校园育人全过程,依托企业实训场景开展岗位德育。通过多方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立德树人育人格局。

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子女的多重困境与协同帮扶机制研究

——以富宁县田蓬、木央为例

中共富宁县委党校(富宁县行政学校) 冯靖

“跨境而婚”的现象是我国西南边境地区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而婚”的现象更为普遍,由此衍生的跨境婚姻家庭及其子女的存在与发展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边疆治理和民生保障的重要议题。本文以富宁县田蓬、木央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政策分析与实地调研材料,从教育公平、家庭教育、医疗保障、心理健康、社会融入等维度,系统剖析跨境婚姻家庭子女面临的多重困境,评估现有帮扶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协同化、精准化帮扶机制的可行路径。跨境婚姻家庭子女作为特殊的流动儿童群体,其成长环境具有双重边缘化特征。一方面,因父母婚姻未依法登记,子女往往无法顺利落户,成为“黑户”儿童;另一方面,因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薄弱,父母一方为外籍且文化适应困难、家庭稳定性差等因素,使这些儿童在教育公平、医疗保障、心理健康、社会融入等方面承受着多重压力。

一、富宁县跨境婚姻家庭及其子女现状

富宁县地处两国(中国、越南)三省(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地带。其中,与越南直接接壤的区域主要为田蓬镇与木央镇。这片狭小的地域内,世代居住着汉、壮、苗、瑶、彝、仡佬等多个民族。与富宁县相邻的越南一侧,主要为河内省下辖的苗旺县与同文县。该地区同样聚居着汉(汉族)、瑶、山瑶、赫蒙(苗族)、傈僳(彝族)、依(壮族)、布依等多个民族。从地缘结构看,富宁县处于边境治理的交叉节点;从民族构成看,双方边民具有高度同源性。这种空间与族群的双重重合,决定了中越边境两侧边民之间天然存在悠久的通婚历史。

据调查统计,富宁县与境外人员通婚涉及13个乡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县涉外婚姻共计2161对,其中未办结婚证共有1491对,占比高达68.99%。同时,随着跨境婚姻趋于稳定,跨境婚姻家庭的组合模式逐渐从“中国新郎+越南新娘”过渡到“中国父亲+越南母亲+子女”的复合形态。作为构建一个完整家庭的

一份子,“子女”是跨境婚姻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富宁县跨境婚姻家庭子女的多重困境

其一,户籍壁垒导致跨境婚姻家庭子女在入学与升学两个层面面临制度性断裂。一方面,因父母未办理合法婚姻登记,子女无法取得中国户籍,无法在学籍系统中完成正常注册,入学权利受阻。另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的临时就读安排无法延续至高中阶段,中考报名资格受户籍限制而丧失;以富宁县为例,该类儿童九年级后无一升入高中,教育发展路径被强行截断,形成显著的“升学天花板”效应。此外,家庭经济困难制约课外语文资源获取,非汉语家庭子女语言障碍影响课堂参与,而边境学校面向跨境儿童语言发展特点的专项教学资源供给明显不足,学业支持体系薄弱。

其二,跨境婚姻家庭面临结构性困境:首先,家庭稳定性脆弱,外籍配偶因身份限制导致就业窄、收入低,加之文化隔阂,“新娘逃跑”现象频发;更为严重的是,生父亡故或离异后,外籍母亲常放弃抚养权并失联,形成“弃子”事件,使儿童陷入监护真空。其次,家庭教育支持薄弱,外籍配偶受教育程度有限,育儿理念与语言障碍突出,且父母外出务工普遍,祖辈代养难以满足儿童学业与成长需求。再次,亲子情感联结匮乏,母亲失联或家庭经济压力致使亲子互动时间不足、陪伴质量低下,儿童长期面临情感缺失风险。

其三,医疗保障缺失构成跨境婚姻家庭子女健康权的制度性障碍。因未落户而无法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致使基本医疗费用全额自付,日常就医行为受阻,健康风险持续累积。同时,预防接种、生长发育监测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低下,疫苗接种不全问题突出,传染病暴露风险升高。外籍配偶自身医保缺失亦削弱其对子女的健康照护能力。加之家庭经济普遍拮据,大病重病易诱发“因病致贫、因贫弃医”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固化健康弱势地位。

其四,跨境婚姻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突出。一是双重创伤与依恋障碍。

父身亡后母亲失联等“弃子”事件,使儿童承受丧亲与被遗弃的叠加打击,极易诱发依恋障碍、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家庭长期不稳定亦造成持续应激状态。二是身份认同困惑与自尊受损。跨境文化背景使儿童面临归属感模糊与同伴标签化歧视,自尊水平下降;研究亦表明,其心理适应受情绪调节、认知模式、心理韧性等多因素交互影响。三是心理支持体系薄弱。边境学校普遍缺乏专职心理健康师资和专业社工,筛查评估与干预能力不足,心理问题常被误判为行为问题,现有试点项目覆盖面与制度化水平有限,难以形成有效干预。

三、富宁县跨境婚姻家庭子女帮扶机制构建的基本路径

第一,建立落户绿色通道与跨境证件互认机制。一方面,对长期实际居住但材料不全的跨境婚姻家庭,推行备案制与容缺办理,降低落户制度门槛;另一方面,探索与越南建立出生证明、婚姻证明等官方证件的互认与认证简化机制。再则,针对经济困难家庭无法承担亲子鉴定费用的问题,设立专项补助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予以支持,破除落户环节的经济障碍。

第二,完善教育保障体系,实现入学公平与升学衔接。突破户籍绑定,允许实际居住于辖区内的跨境婚姻家庭子女,凭借基本证明材料以“非户籍学生”身份注册入学,享有同等教育资源,此为教育公平之制度基础。同时探索建立合规条件下的中考、高考参与通道,或与越南教育部门合作提供多元化升学路径,保障儿童发展连续性。

第三,构建分级分类的心理健康支持网络。借鉴“织锦三色”心理风险分级工具,精准划分绿、黄、红三档风险等级,配套“早发现、早介入、早支持”的预警干预机制。在边境学校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或驻校社工,构建“专业社工+教师骨干+小小志愿者”多层次校园服务模式。对经历遗弃等严重创伤儿童,建立“一人一档”个案管理制度,提供长期追踪式心理康复支持。

第四,提升医疗保障可及性,化解健康风险累积。探索将未落户子女

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通道,或设立专项医疗救助基金予以兜底。加强边境妇幼保健服务对跨境婚姻家庭子女的主动覆盖,确保预防接种、生长发育监测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该群体,切断“因病致贫、因贫弃医”的恶性循环。

第五,健全家庭监护支持与替代照护体系。建立针对“跑婚”风险及“弃子”事件的早期预警与干预机制。对失去父母监护的儿童,及时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体系,提供寄养、收养或机构照护等替代安置方案。同时推出双语家教宣讲、家长夜校等特色服务,提升外籍配偶及家庭的亲职能力与教育参与水平。

第六,促进社区融入与社会支持网络建构。依托村(居)委会、驻村工作队及“爱心妈妈”结对帮扶等基层力量,拓展社区支持资源。在边境村寨开展消除歧视、促进包容的社区教育与宣传活动,消解社会排斥,营造有利于跨境婚姻家庭子女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

四、结语

跨境婚姻家庭子女的困境是多维制度障碍与社会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以富宁县为例,68.99%的跨境婚姻未依法登记,这一制度性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外籍配偶子女在落户、就学及就医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进而引发教育受阻、健康风险累积、心理发展受损及社会融入困难等一系列连锁性困境。该困境在本质上不仅关乎民生保障,更涉及边境治理效能与民族团结进步,其核心矛盾在于边民通婚的现实需求与现行户籍管理、教育准入等制度安排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张力。破解这一困境,亟需实现从“管理优先”向“儿童优先”的治理理念转型,推动服务体系由“碎片化试点”向“体系化覆盖”升级,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与精准化帮扶,构建制度化的支持框架,以切实保障边境地区每一名儿童的全面发展权益。

【本文系文山州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越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项目编号:WSSK2026073)阶段性研究成果】